

首个“荷花奖”当代舞奖项的突破—— 《觉醒》用创新表达呈现红色题材

◎ 王小作

近日,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当代舞、现代舞终评结果出炉,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原创的当代舞作品《觉醒》以第一名的成绩,斩获本届当代舞类别奖项。该部作品由一级编导董华兴、青年舞蹈家赵磊共同编创,由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演绎。

《觉醒》以1923年至1925年间,一批蒙古族知识青年前往北京蒙藏学校学习的历史为背景,编导经过实地采风与史料阅读,通过舞蹈语汇还原知识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长进步的景象。作品情感充沛,讲述了蒙古族知识青年在寻求救亡图存、民族解放的道路上遭遇的敌对势力压迫,再现了他们互相扶持、不畏牺牲、奋发图强的伟大精神。

2025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当代舞、现代舞终评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下,内蒙古艺术剧院创排当代舞作品《觉醒》,是用文艺的方式传承红色基因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举措。回顾内蒙古在全国重要舞蹈赛事中获奖的作品,多以民族民间舞为主,现当代舞并非内蒙古舞蹈强项,而《觉醒》的成功,是其作为自治区最大文艺院团,在国家级专业舞台上的主动探索与自觉担当。

形式的突破:红色题材的当代艺术转化

红色题材在文艺创作领域屡见不鲜,其内涵的红色精神是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融入舞蹈作品创作中,能够使革命精神可视化、情感化和艺术化。内蒙古艺术剧院此前创作的舞剧《骑兵》是以民族民间舞为主要表现形式,讲述内蒙古骑兵的红色故事,并获得第十七届文华大奖、第十三届舞蹈荷花奖舞剧奖、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多个重要奖项。

而此次内蒙古艺术剧院再次以红色题材



为创作来源,创排当代舞作品《觉醒》,以当代舞的艺术手法追溯内蒙古知识青年觉醒、反抗压迫、寻求民族解放道路的历程,为红色文化的现代呈现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践样本。

当代舞作为一种打破程式、强调个性表达的舞蹈形式,具有融合性和实验性,近年来也成为不少舞蹈作品的呈现方式。《觉醒》采用当代舞作为表现形式,更能以肢体语言还原历史故事,增强作品叙事感,作品中跑动、摆臂前行等动作,以“克制”的发力方式区别于民族舞的“大开大合”,更强调舞者对音乐律动的感知与呼吸的同步,展现了知识青年在思想进步、追逐光明道路上的鲜活形象。

作品中段,多松年牺牲后的场景尤为典型,领舞赵磊在前方小幅度摆动肩膀,身后群舞逐渐以相同动作显现,在倒下的同时被身边的伙伴扶起,这一编排不仅隐喻革命事业前赴后继的精神,也通过肢体语言实现了历史与当下的对话。

集体的镜像:群像塑造与革命记忆的建构

近年来,不论是舞剧还是舞蹈作品,创作者们开始将舞台叙述的主角由个体转向集体,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尤为常见,群像叙事更能塑造革命历史中“人民英雄”的形象。《觉醒》的叙事焦点从个体转向集体,将北京蒙藏学校的蒙古族知识青年群体作为主要叙述主体,编导在编创中没有特意明确领舞的具体人物角色,通过将真实历史故事、人物凝练投射到作品的角色中,拓宽了领舞的表现范围,使其既可以指代乌兰夫等蒙古族知识青年,也可以代表诸如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蒙藏学校进行讲学的革命领路人,这种模糊化的处理,将“有人引领”的意象贯穿始终,赋予作品更为深厚的历史感,也给予了观众一定的想象空间,也更能唤起观众对这一段历史的集体记忆。

《觉醒》中最为直接的群像塑造,也是编导编创的灵感之一:由舞者在台上以合照的形式还原北京蒙藏学校学生的老照片,将镜头对准

整个群体,引导观众将视角集中于这个时期内蒙古各族知识青年在革命思潮中的“觉醒”,体会知识青年的情感堆叠,作品也是在这一幕将情绪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此外,舞蹈动作的编排上也体现了群像的统一性与独特性。例如,在作品开始的场景中,群舞之间动作各自不同,存在差异,后保持统一,既隐喻了不同青年个人命运的独特性,又保持了作为知识青年追求民族解放道路的一致性,展现革命历程中个体与集体的辩证关系,形成了富有张力的视觉表达。

服装设计进一步强化了群像的集体身份。整体色调统一,制式上融合了蒙古袍、中山装、马褂、长袍等服饰,既体现了蒙古族知识青年的民族身份,也展现了内蒙古各族青年在革命运动中的团结统一。这种设计不仅符合历史背景,更是通过视觉符号构建了多民族共同奋斗的叙事框架。

隐喻的生成:舞台符号与观众共鸣

《觉醒》能够收获评委和观众的认可,不仅在于表现形式与题材的贴合,更在于其通过隐喻手法将抽象的历史意义转化为舞台上可知可感的具象表达,这种隐喻体现在道具与灯光的运用上,构成了作品的多层次叙事。

道具方面,作品仅有长方形的木板作为核心符号,虽然单一,但是在不同语境下承载了多元象征,与舞蹈动作结合在一起,提升了作品的叙事完整度,增强了舞台表现力。例如在作品开头,配合背景开关门音效,此时木板的开合则是作为“门”,打开这段觉醒之路的门,也打开了以赵磊为领舞代表的知识青年与毕希日乐图为领舞之间的往事回忆之门。同样,在作品中段领舞毕希日乐图背靠木板被抬升至上方,灯光由白转红,人物逐渐倒下,木板则成为革命烈士多松年在张家口牺牲时的大境门,展现多松年被捕后,被残忍杀害的历史故事,这是木板作为具象物体的表现。

而当舞者背着重达30多斤的木板在舞台

上前行时,木板又成为知识青年所背负的为人民解放,为民族复兴的责任重担;在毕希日乐图饰演的知识青年被捕时,与不断靠近的木板进行抵抗与斗争,最后在木板的“压迫”下撕碎情报信息吃进嘴里,木板又代表着敌对势力对追求进步的革命人士的围剿与压迫。这种符号的多意性,增添了作品的深意与层次,艺术化呈现了伟大革命精神的深刻内涵与价值,激活观众的感知,达到编导编创的目的。

灯光设计则进一步强化了时空交错与情绪渲染。在作品前段,追光与侧光的运用,将两位领舞、群舞分割为多个叙事时空,一个是以多松年为代表的的知识青年在执行任务的场景,一个是以领袖式人物为代表的青年在回望与找寻的场景,随后加入群舞当中,最后则是以群舞为代表的青年集体在反抗、在追逐光明道路上的场景,灯光将不同时空汇聚在同一舞台空间中,增强了作品的叙事层次感。

同时,在作品后段,领舞毕希日乐图与往日同伴站在不同光中,青年相聚时,红光消失,灯光转为暖黄色,又代表着人物记忆的回溯;合影后随着灯光逐渐由暖变冷,人物意识逐渐回到现实,单独的白光下缺少昔日的伙伴,更将革命烈士牺牲的悲壮氛围渲染浓烈。通过这样的灯光设计不仅提升了舞台的视觉层次,更通过色彩与明暗的变化,突出单个知识青年在革命道路上的奉献意义和集体的追寻与坚守,引导观众与舞者情绪同步,引发共鸣。

《觉醒》的突破意义不仅在于其作为内蒙古当代舞作品的历史性跨越,更在于其对内蒙古舞蹈艺术谱系的拓展。从《鄂尔多斯舞》《盅碗舞》等民族民间舞,到《骑兵》的舞剧探索,再到《觉醒》的当代舞成功实践,内蒙古艺术剧院逐步实现从民俗展示到当代表达的转型,这种转型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否定,而是一种新的探索与融合,让传统在当代语境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这种尝试突破的成功,既得益于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在舞剧《骑兵》巡演中的经验积累,演员在相同题材剧目作品的核心理解上更为深刻,更能琢磨该故事背后的历史意义以及人物心理状态,放大人物在故事中的情绪与情感,用日常化的动作与细节刻画角色的内心世界,让作品中的人物有温度、有情感,避免叙事走向空洞。同时,也得益于编导对于舞者演员的高度训练和引导,尤其在民族民间舞转化到当代舞模式中,需要舞者心理和身体上的调整进入状态。

近年来,红色题材的舞台艺术作品得到众多年轻观众的关注与讨论,《觉醒》也不例外。通过观察和分析年轻观众的评价可以得知,年轻一代观众甚至更容易被红色题材中家国情怀、理想信念等方面的表现而感动。《觉醒》的成功提示我们:红色题材的艺术创作不必拘泥于既定的叙事模式,可以更具创新性的叙事与美学手法,唤醒年轻观众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本文图片为当代舞《觉醒》剧照)



近年来,微短剧凭借其“短、平、快”的特点迅速走红,“吸睛”的同时也“吸金”。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微短剧用户规模达6.62亿人,网民使用率近60%。与此同时,根据中国网络视听节目协会发布的《2024年微短剧行业白皮书》,2024年全国微短剧市场规模约504亿元,预计2027年将超过1000亿元。

面对风头正劲的微短剧发展浪潮,一批高品质作品顺势而为涌现出。近期热播的《冒姓琅琊》细致呈现传统服饰、建筑风貌与书法艺术,受到众多历史爱好者的高度评价。《东北爱情故事》全网播放量超15亿次,该剧紧密贴合上世纪90年代东北经济社会环境变化,传递出困境中乐观向上的精神力量。除此之外,《暗潮涌动》《怒刺》等一批抗战主题微短剧集中上线,几分钟一集中却承载了万钧之重的家国情怀,引发网友主动转发、评论、落泪、致敬。

尽管今年9月底,国家广播电视台总局相关负责人明确指出,将对行业存在的“雷人”剧情、“霸总”人设等问题进行系统性纠偏,然而目前在一些主流短剧平台,渲染夸张财富、宣扬攀附权贵恋物观的“霸总”形象仍频繁出现。此类微短剧“用写实外衣包裹荒诞剧情”,既渲染了金钱至上、权势至上的价值观,某种程度上也容易影响公众对企业家的认知并损害其群体形象。

不管怎么说,微短剧,得“好看”。这里所谓的“好看”,制作方不仅要拍出好镜头,还得讲出好故事。今年被业内广泛视作微短剧行业升级的关键年,精品化成为行业追逐的方向。很多微短剧在制作上都意识到了视觉呈现的重要性,不惜在服装、道具、美术乃至拍摄装备等各个硬件环节投入大量资金精力,高企的成本带来了微短剧在视觉效果上立竿见影的提升。呈现在竖屏中的镜头与画面,正不断向传统电视剧乃至电影看齐。字面上意义上的“好看”,已然成为精品化微短剧的标配。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还远远不够。

微短剧精品化并不意味着简单在拍摄上求“贵”求“美”,对此,正如业内人士认为的,“我并不认为短剧精品化只是单纯提升画面精致度或者更趋于精英化叙事。精品短剧必须要尊重观众的喜好,让故事能与观众发生共鸣。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创新,提升表演和制作水准,把故事的风格和调性还原出来。”

的确,微短剧虽形式短小,但在内容上不能流于浅薄,要真正做好做精,并不容易。这就需要制作者正确认识并且稳妥处理好高流量与高质量之间的关系。制作者自己首先要相信优质内容是观众真正的刚需,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地理顺微短剧的发展逻辑,不断增强自身对于文化价值的把控力,努力奉献一批题材新颖、表现妥帖、接地气、有高度,能够深度征服大众的精品力作,这样才能使行业发展之路越走越顺,否则的话,阅剧无数的观众难免会“边看边骂”,终致用脚投票。

时代催生微短剧,微短剧也应当契合时代发展之需。“好看”的作品,终将受市场欢迎,被时代“看好”。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微短剧的赛道上,从不是谁跑得快谁赢,而是谁走得稳谁赢。但愿今后,更多从业者坚持稳扎稳打,坚守创作初心,用发光的故事、精美的呈现造就“好看”微短剧,让微短剧热潮从“流量密码”升华为“文化印记”。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鄂伦春族作家首部长篇小说《雪猎》读后感

◎ 王丙珍

2025年9月,鄂伦春族女作家侯波创作的长篇小说《雪猎》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此部作品是中国作家协会2020年度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之成果,亦是鄂伦春族作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雪猎》以主人公吴氏家庭的一对姐妹艾戈艳及姐姐艾玛汗的成长、选择、婚姻与经历为主线,在历史的长河中展开刺尔河畔鄂伦春人的人生史、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与人类史,在生存、生产、生活、生计、生命与生态中勾勒鄂伦春族民族精神及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现实境况。正如作者在后记中记载其姥姥吴秀芳的嘱托:“我说我的故事要让我的后人写,这是我的家族史、民族史。”而作者正是通过两位女性主人公相互交织的人生故事,书写了鄂伦春人勤劳善良、勇敢坚强、乐观豪放、生命至上、珍爱生态的民族精神,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不让一个民族掉队,让所有民族同胞都幸福生活在祖国大家庭里”的伟大民族政策。

《雪猎》以火神神话为引子,以雪猎的赞达仁、马嘶、犬吠为尾声,以天地、四时、星辰、日月、山川、风雨、河流、雪猎等八章建构故事内容,讲述鄂伦春族不一样的人间烟火。艾

玛汗与艾戈艳姐妹二人虽为同一母亲所生,却从小分离,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艾玛汗是艾戈艳心中的榜样与力量。她们的人生在二元对立与统一中定格于1953年9月28日新生鄂伦春民族乡的定居生活中。出生后,她们的母亲去世,妹妹艾戈艳随父亲与继母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而艾玛汗随孤身一人三打塔木善生活,辛苦地照顾他的生活起居。16岁时艾戈艳成为萨满,艾玛汗则承担起家庭重任。艾戈艳接受了指腹为婚,幸运地与心地善良的卡图尔结为夫妻;艾玛汗却坚决反抗塔木善包办的、与古拉依尔的婚姻,她自主地选择了苏赫欠为丈夫。结婚后,艾戈艳听从丈夫安排,安心享受甜蜜恩爱的传统生活;艾玛汗则在丈夫被日本人打死后,养父又患眼疾的情况下,为了生存下去,违背了鄂伦春女人不能使用狩猎工具、不打猎的禁忌,进山打猎,她还改名为英霞,参加剿抗日队伍,誓为丈夫报仇。

“艾玛汗望着远去的背影,耳边回响着李天安的话:生活应该由自己主宰,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后来,艾玛汗与李天安因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信仰而结为革命伴侣,两

人缔结为团结户。她也没有遵从鄂伦春族再婚女人须将孩子留给婆家的规矩,“现在艾玛汗带着孩子再嫁真是破了例”。

作者擅用东北方言、谚语、比喻、神话、传说、故事、史诗、民歌、玩具与游戏,在诗情画意、动物相伴、娱乐休闲、生死存亡的时空中编写着历史叙事、女性叙事、生存叙事、生命叙事与生态叙事,正如作品所呈现的那样,“有生命,就有生存的方式”。作为鄂伦春族第三代作家,作者本身已远离民族游猎的生产生活方式,其记忆深处沉淀着姥姥的文化记忆。作者在双重的生态审美记忆中,立足于女性视角与审美体验,揭开鄂伦春族从原始游猎社会到下山定居的历史序幕。文本中,虽然狩猎生产生活方式、萨满文化、民俗文化的描写更多是排列式、介绍性、常识性与学术性的,但饱含着鄂伦春族女性主体的情感、想象、记忆与认同,“万物都有轮回,你不伤害它,它就会成为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

《雪猎》贯穿小兴安岭之雪与鄂伦春族游猎生产生活之审美意象,从女性视角描绘雪季、雪原、雪地、雪野、雪花、雪水、雪兔,厚描出猎、

围猎、追猎及不猎而猎,“阿迈走过去,大狗子斜卧在草窝里,三岔狗角的狗头真好看,能做一个漂亮的灭塔哈。”鄂伦春族婚姻礼仪以民族传统与氏族规范为核心,艾戈艳婚礼中关于开脸的仪式融合了汉族礼俗,实为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朝鲜族、汉族、鄂伦春族等各民族人民皆在同一生态空间中相生共存,“对于苏赫欠这样的猎民来说,雪就像农民的雨、牧民的草。”小说作品中大公鸡的陌生化、吃土豆、面饼等情节描写,皆表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事象,人们向往美景、美味、美德与美好的生活以及“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美未来。由此,作者不仅讲述了一个鄂伦春族故事、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一个中国故事,更是讲述了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故事。

《雪猎》承载个体性与民族性、感性与理性、传承性与变迁性、身体性与实践性、时间性与空间性之并存,以源于生命接力式的审美记忆塑造生态审美文化认同感,激活地方的环保意识,提供民族精神慰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想象共同体,而是文化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生命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